

一本书,看遍大青山草木

本报记者 高爽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华杰最近出版了一部很有趣的书《青山草木》,专门介绍吉林大青山的野生植物,用精美的图文展现了大青山春花、夏叶、秋实、冬雪的季节景观以及当地常见的花草树木。

一位哲学教授为一个旅游区的野生植物“作传”,这件事同样有趣,也与他近年来致力于复兴博物学的工作有关。围绕这本书和博物学的话题,记者采访了刘华杰。

本报记者:博物学这个概念对一般人来说还陌生,也是这本书让我们感兴趣的原因之一。什么是博物学?您致力于复兴博物学,向大众普及博物学知识,目的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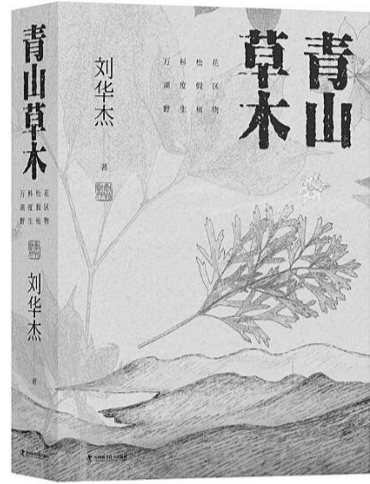
刘华杰:“博物”是一个古老的认知传统、生活方式。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博物学文化,中国古代文明不是只靠现在讲的狭义“国学”而发展过来的,除此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物质基础,形而下的方面,博物就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就大尺度的人类社会发展而论,靠的不是只有极短历史的近现代科技、高科技,而是平稳发展的博物学。在英文中“博物”一词是 natural history,其中 history 不是“历史”的意思,而是“探究”的意思。什么是博物学?粗略地说,它是对大自然的探究,但又不同于当下职业化的科学家的探究。博物学主要在乎普通人通过日常观察,感受来记录大自然的现象,描写大自然中的动物、植物、岩石、矿物、生态系统等。换一种说法,博物是普通人对自然界的一种“访问”,“访问”的方式和内容非常丰富。

复兴博物学,包含两层:一是二阶学术层面,要研究博物学的历史、人物、博物认知、博物文化、博物艺术等;二是一阶实践层面,指实际参与对大自然的探究,这种探究可以是很随意的,也可以是相对讲究的。我不愿意用“普及”两字,因为它蕴涵了上下级的关系。博物,重在实际操作,重在参与。博物学不同于自然教育,后者热衷于教育别人,而前者重在教育自己,自得其乐。

本报记者:作为一位哲学和科学史的学者,做这样一本书肯定别有深意吧?特别是在环保和生态保护成为当下热点的大背景下,您希望达到的是什么?

刘华杰:一般的哲学工作者不会对植物

提示 “您很优秀,因为您对植物感兴趣。植物增添了山川的色彩,也成就了大地上的文明。大青山是国家4A级景区,考虑到他人也需要这里的植物,请不要在这里采野菜、挖药材、折草木。至于野果,可以如博物学家梭罗所言,在野地里适当品尝。前提是,您分辨得一清二楚。”《青山草木》一书首页这段话,隐含着作者复兴博物学的目的。



感兴趣。另一方面,如果我是一名植物学家,恐怕也不会写《青山草木》。现在的植物学家对这类工作兴趣不大。

我没有在课堂上学过博物学课程,只是个人喜欢植物,经常到野外看植物,也自学了一点点植物学。就大的方面看,我一方面吆喝博物学文化,倡导研究博物学史;另一方面

想做一个实验,拿我自己做实验,看看像我这样没有专门学过植物学的人,能否认出、理解我所见的植物。实验分三个阶段:近、中、远。我都试过了,结果还可以,结论是:植物就在我们身边,它们是人类的伙伴,普通人可以辨识植物、欣赏植物,并通过观察植物而了解所在地的生态及其变迁。关于“近”,我写了《燕园草木补》,关注的只是我们北京大学校园内的植物,与此接近的还有《崇礼野花》《延庆野花》。关于“远”,我写了《德岛花事:夏威夷植物日记》,关注的是异国他乡美国夏威夷群岛的植物。关于“中”,我写了《青山草木》,关注的是吉林省吉林市万科松花湖滑雪场的植物。这些书现在看可能都不重要,但我希望50年后、100年后,它们会成为一份可参考的史料。

重拾古老的博物学,确实有哲学层面的考虑。第一是我对现代社会发展的现状极为不满,即对“现代性”持强烈的批评态度;第二是在科学哲学上,受波兰尼的《个人知识》一书和“个人致知”观点的影响;第三是受胡塞尔和海洛一庞蒂现象学的影响,具体讲涉及“生活世界”概念及“具身”问题;第四是想重写科学史或者人类文明史,尝试提出“博物编史纲领”,现有的科技史和文明史存在严重的偏见,宣传暴力、操纵力,鼓励人们恶斗而不是共生。我们怎么重新书写自然科学的历史?在工业文明遭遇大量问题的当下,天人系统如何可持续生存,如何重塑人类质朴心灵?这些都是我想探讨的问题。

本报记者:作为一个普通读者,会以“好看”来评价本书。本报对此书感兴趣的另外一个原因也在于书中的很多植物与辽东山区的植物很相似,所以感到亲切。“好看”这样的简单评价您会满意吗?

刘华杰:“好看”,就如“有趣”一样,是个很高的评价了,谢谢!博物学的定位始终不离审美和生活,即在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博物还有更基本的一面:好玩,让人快乐。好玩极为重要,它使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有趣,生活质量得以提高。孩子爱玩,成人也一样,只是通常不敢言“玩”。普通人通过观鸟、赏花、登山、生态旅行等,探究大自然的同时,也会获得一种存在感,概括起来就是四个

字——博物自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够了解大自然和我们自己,让我们自由、自在。哲学家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他发现了“我思”的基础地位,类似的,我们也可以说:“我博物,故我在。”

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中,博物学均十分发达,中国人吃饱饭过上小康生活,博物学也一定会发达起来,我们做的工作是推动。现在正规教育无视博物学,这件事只能在社会上推动。

吉林的植物与辽宁的许多物种一致,我希望通过此书,让人们回忆起与植物的友好交往,重新关注身边的草木。爱家乡,可从身边的草木开始。关注草木,我们的心情、生活品质也会发生变化。我希望这类书多起来,东北每个国家公园,每个保护区,每个景区,都应当有这类手册,现在基本没有。除了植物,也应当关注鸟、昆虫、岩石、蘑菇、哺乳动物、两栖动物和爬行类动物。

本报记者:作为热爱家乡和关注自然的普通人,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特别是对我们这些被城市困住、没有太多机会接触大自然、了解植物的人,我们还能“博物”吗?

刘华杰:博物的内容太多了,在城市里,也可以看星星、观云、看动物,最简单的还可以看昆虫,昆虫有100多万种,到处都是,想回避都难。植物也特别容易见到,哪个小区都有植物,家里的一日三餐,也都有植物。走进大自然,不一定非得到遥远的地方,在自己的小区,甚至校园、街道就可以做到。

了解这些事物,对我们的祖先来说是必需的。哪种野菜能吃,哪种有毒,什么动物比较凶猛,怎么判断天气,表征着一个人的见识和生存能力。人说到底是个自然物,不是机械,不是房子,更不是“比特”(信息单位)。自然之物最终是要跟大自然达成和谐,从个体看是这样,从群体上看也是这样。如果个人博物水平很差,即使书读得很好,人格与能力还是有欠缺的,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我们可能会藐视大自然,以为自己的存活不靠大自然,我有钱、有房子、有车就能活,没想过车跑在什么地方,钱是从哪儿来的,房子是建在什么地方。这样的文明,是飘在空中的文明,没有根。

还原集美学村那些先生们的足迹

毕亮

写散文的陈满意,突然出版了《集美学村的先生们》这样一本学术性颇强的书。

陈满意是社会新闻记者。《集美学村的先生们》的写作,与他的职业是分不开的,他是向记者对新闻素材的敏感,发现了集美学村这个写作空白,于是用了几年时间,东奔西走访问知情人,在故纸堆里动手找资料。据说,为了这本书,他跑天津,赴北京、上海,还委托各地师友代为查找资料,搜集到的纸质材料就有一米多高。这样的过程,持续了3年多。

陈满意让许多湮没在历史尘埃中集美学村的先生们重新得到关注,要知道,其中的一些先生们,在网络时代的今天,

都是“百度”不到的。是陈满意重新为他们在网络检索中创建了词条,开始逐渐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将学术眼光投入到早已被忽略的角落。

正如陈满意自己所言,那些先生们,有名家,更多的是曾经一度知名,如今早已被淡忘的“名家”。陈满意在看着一个名字时,感受不到他们生命的温度,“那些远去的名家,仿佛隔着一层窗户纸,影影绰绰,缥缈着,看似在眼前,却又遥不可及”,于是陈满意打算捅破这层窗户纸,看看清楚。

我是抱着敬意读陈满意这本书的,读的过程持续了几个月。但就是这几个月,我多半在固定的时间,打量陈满意笔

下集美学村的先生们,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治学,他们的足迹,都吸引着先生的目光。我的目光,也在不停地跟着先生们的脚步奔走。

我是从这本书中对“集美学村”有所了解的。100多年前,陈嘉庚在集美创办了两等小学,之后又先后创办了集美师范、中学、水产、航海、商业、农林等十多所学校。也是从《集美学村的先生们》中才知道,黄炎培、钱穆、龙榆生、马寅初、鲁迅、蔡元培、马叙伦、王鲁彦、方玮德、许钦文等人都曾在集美学村留下过或长或短的足迹。陈满意写到的30多位先生,诸如语文教育家阮真,研究老庄的学者

蒋锡昌,历史学家、把钱穆引荐到集美任教的施之勉等人,更是首次听说。而五四运动骁将蒋希曾,曾在《鲁迅日记》中出现过,就是他邀请鲁迅到集美演讲的。陈满意学问做得细致,不但不放过细节,而且还还原被历史忽略的细节,用史料说话,展现了一个群体的侧面,这样的侧面往往还不太为人所知。

陈满意虽是文学创作出身,但写起学术随笔来,深知其中底数,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不杜撰,不猎奇,所以在她笔下的文章平实而不平淡。一如他写到的先生们一生,背影虽然远去,但足迹磨灭不了,都印在了纸页间。

鲍曼眼中的现代性

战宇婷

看点

一转眼,齐格蒙·鲍曼已经走了两年。好在,他的洞见,不会因为生命的逝去而消失。不知道一年后,还有多少人记得1月9日是他离开的日子。毕竟这个时代,我们忘却得总是太快。作为犹太人的鲍曼,参与了20世纪的每一个历史节点,却屡屡变为社会的边缘人。边缘人的身份和视角,使他能够看到政治、历史变换中的真相,并且站在底层与弱势的视角去审视发生的一切。他关注底层,因此有了《工作、消费和新穷人》;他关注现代性与流动人口,因此有了《废弃的生命》《流动的现性》等;而犹太人的身份使他直面大屠杀浩劫,因此有了《现代性与大屠杀》,这本书为鲍曼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犹太人,流亡,迫害,这些关键词不断闪烁在齐格蒙·鲍曼的生命中,也成为他学术研究的思想基点。

社会学家鲍曼1925年出生于波兰。犹太家庭出身使他饱受反犹浪潮之苦。二战爆发后,鲍曼举家逃亡苏联,不久他加入苏联的波兰军队,却在1953年再次成为反犹浪潮的牺牲品——被免除军官职务。从这以后,鲍曼转向了学术研究,直到辞世。

对于20世纪中叶的那场纳粹大屠杀,学界和公众从不同角度对大屠杀的原因和结果进行反思,然而,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在对大屠杀不断简化的认知中,人们真的认识到这场人类浩劫的本质了吗?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批判了围绕大屠杀的几种常见研究导向。比如,把大屠杀看成是历史上反犹主义的一部分,把大屠杀仅仅与犹太人相连,这使得大屠杀成为围绕犹太人的特殊历史事件,没有普遍性的意义,因而被排除出社会学研究范围。这样的研究取向,在当下的结果就是,犹太国家把大屠杀当作其政治合法性的依据,为其排斥其他族群的生存空间提供说辞。另一种看法,则把大屠杀看成是我们文明的一次断层、损伤、痼疾,将大屠杀看作社会现象中的一种极端,一次不可避免但却不会再次发生的事件。这两种看法,要么突出大屠杀的特殊性,要么将其淡化为一般事件,但都没有触及大屠杀的本质,这样的看法,“不仅导致了自我辩解的道德安慰,而且导致了在道德和政治上失去戒备的可怕危险”。

鲍曼针对这些观点的反驳,成为《现代性与大屠杀》的基本立论基点。鲍曼认为,大屠杀不是文明的一个插曲,而恰恰内在于现代

性以来的文明本身,大屠杀是现代性大厦的合法居民,是现代性的另一面。德国纳粹得以在短时间里杀掉600万犹太人,恰恰有赖于现代官僚机制的高效运转,工具理性的无比发达。支撑大屠杀进行的每一个条件和手段看起来都是“正常的”,四通八达的火车路线,象征着工业水平的烟囱,官僚机制的缜密运转,无不是现代性工业体系的产物。只不过这些看似理性的工具最后都通向一个绝对非理性的目的——杀戮,大屠杀的进行,恰恰是工具理性与官僚机制的相互配合。

没有德国纳粹官僚机制的有效运转,没有工具理性的设计,没有内在于工具理性的道德弱化,短时间内被高效执行的大屠杀就不可能成为现实,“一大群想杀人复仇的个体是无法与一个规模虽小却纪律严明、严密协作的官僚体系所产生的效果相匹配的”。一旦萌发种族清洗的观念,确定了明确的目标,为达到此目标的手段就被纳入理性的计算和衡量中,一方面是操作的精确性和可计算性,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不断寻找高效解决问题的工具。毒气室并不是一开始就被设计出来的,而是在官僚体制的环境下,为实现高效灭绝犹太人的目的而发明的。另一方面,德国官僚制度融合了军队的冷酷、纪律与精确,使得屠杀行为得以高效运转,同时内在于其中的个体也必然遵守纪律而大于个体的道德。

鲍曼分析了纳粹内部不同阶层施害者的行为与心理。对于上层和中层军官,每一步的杀戮都是上一层的命令,严明的纪律取代了道德责任,个人的良知和道德被抑制;对于下层执行者,纳粹则在视觉上将刽子手与受害者分开,加毒气的卫生官是不允许参观毒气室的。行为与其结果最大程度的分开,结

果是道德的弱化。杀戮的阻碍——道德责任,被无限地弱化,“道德上丑陋的结果被放远到行动者看不到的那个点”。这些手段,恰恰就是工具理性所主导的官僚体系的基本技术,也是劳动分工的现代社会行为的特征。在一个行为人的意图和其最终的结果(杀戮)之间,是大量的行为和不相干的行动者,这使得最初行动的人无法看清其结果,意图和最终的目的脱节,道德感被抑制。

同时,官僚内部的小团体纪律大于个体的道德,一旦个体行为被纳入到组织内部的纪律中,纪律和荣誉就成了唯一的道德,受害者的人性在施害者的视野中消失。官僚机制中的劳动分工,使得每个人成为技术链条的螺丝钉,个体无法透过其当下的行为看到整体的结果,执行命令、遵守纪律是第一位的,道德被压抑了,甚至这种道德冷漠渐渐内化为行为方式的一部分。道德弱化使得受害者的人性被剥离了,屠杀变得更加容易。

除此之外,大屠杀的执行得益于纳粹杀人机器工业流水线般的有效运转。“工业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会计、节约、废物利用以及屠杀中心类似于工厂的效率”,每个人都成为理性链条的一个环节,甚至对于集中营中的犹太人也是如此。犹太人每一步想要求生的理性都被纳粹利用而成为非理性屠杀的一个环节。比如,这本书中写道,犹太人聚居区委员会成员的任务是替纳粹管理犹太人,以求自保,然而随着德国的战败,纳粹为了毁灭证据,依然将这些犹太人送进集中营。在大屠杀幸存者作家莱维的《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一书中,他描写了这样一群人,他们被称为死亡别动队,由犹太囚徒组成,负责将犹太人送进焚尸炉,而后清理尸体,挑出金牙、戒指等有

用的物品。由于他们亲眼见证了屠杀的细节,最终也难逃被杀戮的厄运。这是集中营中最为悲惨的一群人。纳粹精心地将每个人的求生欲望与计算的理性囊括在大屠杀灭绝的步骤中,“借此将他们的技能和劳动应用到毁灭他们自身的任务中去,用来维持生命力的每一项措施都在同时促成德国人的一个目标”。也因此,那些亲眼见证大屠杀最深层罪恶的囚徒,恰恰是无法见证、无法活着回来的人。

鲍曼在这本书中对大屠杀的分析,让我们透过大屠杀这一人类浩劫,看到内在于现代性、内在于文明本身的漏洞和异常,这些异常恰恰来自于我们习以为常甚至引以为傲的理念,正是这些萌发了现代性的理念和技术,使大屠杀得以可能。同时,鲍曼不仅分析了官僚机制、工具理性与大屠杀的关系,还将现代性与种族主义相结合分析大屠杀的成因。在鲍曼看来,现代性是一种永恒的紧急状态,更新、更快、更好、更完美的生活和社会,是现代性的永恒追求。现代性总是试图用新的社会规划来替代旧的规划,现代性文化就像“园艺文化”,园丁修剪修剪杂草,正如一个社会以生物威胁的名义将那些危害“进步”的群体隔离和清除。同时,现代性的出现,也伴随着反现代性的冲突,在历史上一直处于社会中“内部局外人”的犹太人,同时也是有资本而没有民族归属的犹太人就成为众多冲突的中心。内在于现代性的种族主义观念,辅之以现代性的工具理性精神及其官僚制度,就是大屠杀的成因,也是我们借以反思大屠杀的基点。

2017年1月9日,齐格蒙·鲍曼永远停止了思考。“大屠杀就像是一幅挂在墙上的画,还仅仅给人很少启迪。”鲍曼的声音至今仍在。

书单

穿越历史的河流

时光太快,快到我们浑然不觉。去年买的一大堆书里,有不少书页都还是崭新的,2019年就来了。

身处这样一个碎片化的微信阅读时代,读书愈发地成了一件寂寞又难以坚持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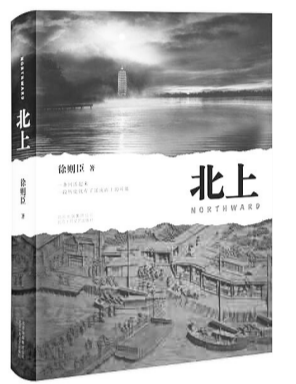
可是,我们始终无法去开书,不管是为了对抗无聊而读书,还是为了隔开嘈杂的庸常而读书,甚至什么都不为而读书。

漫长的日复一日里,阅读是为了从别人的故事里感知情绪,找寻自我,然后与这个世界握手言和。

而喧嚣中,深度阅读,仍是我们看重的。企望那些带有思想性的文字,帮你顶住风浪,熬过凛冬。

本周书单,有一本值得特别一提——作家徐则臣的《北上》。无论中西或古今,河流都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不同文明文化形态的出现及其发展转换无不与大小河流产生种种关系。《北上》以30多万字的宽阔篇幅来写流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将两个意大利人放置到中国运河人文历史书写中,由跨越100多年的视野讲述运河故事,形成了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故事与摄影多重的比较视野,同时以20世纪诸多重大事件介入到人物行动与命运中,使小说具有了时间与历史的长度和厚度。穿越这条历史的河流,我们可以捕捉到徐则臣回望历史的深情,以及他对未来中国的洞见。而作为个体的个人,如何在时代中找到自己的落脚点,本书提供了三种想象。

此外,还有两本新书也值得你关注。每一个新年的到来,都让我们充满期待。翻开书,希望你在岁月更替时,少点焦灼,多点坚定。



《北上》

作为中国地理南北贯通的大动脉,大运河千百年来如何营养着一个古老的国度,又是如何培育了一代代独特的中国人?本书作者徐则臣以历史与当下两条线索,力图跨越运河的历史时空,探究普通国人与中国的关系、知识分子与中国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探讨大运河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地理、文化以及世道人心变迁的重要影响,讲述了发生在京杭大运河之上几个家族之间的百年历史。



《穿行社会》

社会学三大理论之一“系统论”的代表人物亚明·那塞希是德国慕尼黑大学教授,试图从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动景出发,默不作声地深描这个社会。在本书中他一路奔波,穿行于各个场所,借助周游四处的“出租车”这个隐喻,讨论了由不同情境构成的复杂社会。他以此分析的问题是:为何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如此不同?为何我们会拘泥于自己的观点?那塞希指出,我们要能够慷慨地容忍不同的道德观点或者不同的生活方式,保护它们免于受到彼此的侵害。



《权力清单》

简平不愿只站在城市,回看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失落,他想的,是深入到其肌理,探寻当下乡村的真实面貌。2016年初春,他来到浙江省宁波市所辖宁海县,开始了为期一年半的乡村采访活动。在书中,一个个真实、生动、鲜活的故事、细节,勾勒出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三十六条”对于当下乡村的意义。